

柬埔寨媒介：多党制下的新闻控制与争夺

李巽平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柬埔寨; 党派斗争; 媒介控制

[摘要] 柬埔寨媒介在联合国过渡政府时期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产生了多种声音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之后“两首相制”引发的军事冲突, 使得来之不易的新闻自由被权力斗争所湮没。目前, 柬埔寨虽然实行多党制民主, 但媒介仍未能逃脱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操控, 沦为党派宣传机构和索贿工具。

[中图分类号] D733.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1)05-0034-05

Cambodian Media: The Media Control and Power Struggle under the Multi-Party System

Li Yi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Cambodia; Faction Conflict; Media Control

Abstract: Cambodian Media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free development when the UNTAC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ruled in Cambodia. After that, the battle in the two-prime minister government brought great damage to the press. Currently, Cambodian media becomes the tool for various parties and powerful individuals as Hunsen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media.

新闻的发展通常受国家政治的制约, 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也随政局的变化而呈多样化。柬埔寨的新闻媒介随国家政治风云的起伏而几经磨难, 在战火中与其国家一样惨遭炮火的洗礼。国家统一之后, 媒介仍然受到党派斗争的困扰。新闻控制与新闻争夺基本表现为两种模式: 一是战争时期和党派冲突状态下的媒介分裂, 媒介的生存空间被剥夺; 二是国家局势趋于稳定之时, 媒介在受到检查的同时, 被经济势力掌控, 以致新闻蜕化成新闻从业者的受贿工具。

一 国家民主重建为媒介带来生机

柬埔寨于 1953 年 11 月 9 日脱离法国独立, 而后历经西哈努克时期、朗诺时期、波尔布特时期、韩桑林 (三派联合政府) 时期、全国最高委员会

(四派领袖) 时期、联合国过渡政府时期至现今的洪森政府时期。各个时期的新闻控制与争夺随权力阶层的交替而不断升级, 从控制发展到压制, 从压制最后转为毁灭对立的新闻媒介。

在西哈努克时期 (1955 年 9 月—1970 年 3 月) 的最初阶段, 柬埔寨新闻出版业从整体来说比较繁荣, 当时共有 26 种报纸, 约 7 万读者, 其中有 25 种日报, 但它们只在金边发行, “这时的报纸或多或少还有些自由。”^[1] 1966 年, 军人出身的郎诺奉行反西哈努克的高棉社会主义政策, 从而使左、右派的冲突表面化。1967 年, 西哈努克收紧了媒介的自由政策, 以致柬埔寨当时只剩下 13 种报纸, 发行量少于 7 万份。之后柬埔寨北部的反共派山玉成领导的民主党同西哈努克的桑贡组织对抗, 党派活动和各党派的高棉语报纸便全部被查禁。不过,

[收稿日期] 2011-09-12

[作者简介] 李巽平, 博士,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虽很激烈，但西哈努克的桑贡组织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垄断了国民议会的议席，因此政局还比较稳定。报纸在这段时期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不少名编辑，如20世纪7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商业新闻》的编辑杨飒文（Eang Sovan）就是其中之一。

1970年至1975年，郎诺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开始升级，政府甚至可以随时关闭任何报纸，西哈努克派的报纸被迫退出主要阵地。当时的新闻机构普遍“不讲究新闻规律，新闻报道没有时效性，没有新闻分析，热衷于煽情的小报大行其道，可以肆无忌惮地批判某些反对派的公众人物”^[2]。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再次陷入极左的噩梦之中。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组织对柬埔寨的新闻媒介严加控制，并动辄对新闻记者进行严酷的政治迫害，记者被集体“噤声”。当时柬埔寨人民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是广播，但此时的广播电台取消了所有常规的新闻节目，只准播报波尔布特的讲话及其所谓对敌人专政的指示。许多记者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些试图反抗或者稍有异议的记者则被处决。

1979年1月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被越南军队占领，由此结束了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的残酷统治。但此后柬埔寨陷入越南政府的钳制，越南扶植的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统治柬埔寨长达14年之久，柬埔寨的领土上一直驻留着越南人民的部队。为了抗击越南的入侵，柬埔寨境内出现了宋双、拉那烈、红色高棉三股抵抗势力。至1982年，三股抵抗势力成立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政府首脑。这个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因而在联合国一直保留着合法席位。在此期间，柬埔寨媒介如同这个国家一样遭到分裂。一边是地处泰国边界的柬埔寨抵抗组织的广播电台，各派别的广播电台所发挥的最大功能是联络各抵抗组织，号召人民共同抗越。另一边则是越南扶持的傀儡政权金边政府，金边政府保持了苏联式的新闻媒介，执政的人民党共有11个广播电台，唯一的独立电台在1988年被关闭，所有柬埔寨语言的电视台都直接受执政党的控制。

几十年的战争摧毁了柬埔寨的文化事业。1991年10月达成的巴黎协议使柬埔寨长达20年的内战终于结束，此时，除了金边政府的机关报《人民报》和另外三家杂志外，柬埔寨基本没有其他印

刷媒体。联合国过渡政府成立后，媒介获得了宝贵的和平生存环境，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过渡政权（UNTAC）于1992年率先创办了一家广播电台和2份报纸——《柬埔寨日报》和《金边邮报》。《金边邮报》是英语版，《柬埔寨日报》则分别以高棉语、日语、英语等不同的版本出版，它们在柬埔寨重建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引导舆论、进行民主启蒙等作用。如联合国过渡政府为了鼓励选民参加投票，向他们免费赠送了346,000个收音机。过渡政府的广播电台不厌其烦地告知人民，他们的选票是保密的，从而使参加投票的选民高达90%^[3]。此后，柬埔寨的编辑们也克服了对说真话将受到惩罚的恐惧心理，恢复了第一家高棉语报《和平之岛》。1993年柬埔寨举行大选，全国共有40多个政党参选，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和广播电台的产生，当年报纸就发展到约30家，第二年达45家，到1995年升至90家^[4]。其中，西哈努克和朗诺时期的媒介东山再起，联合抵抗组织的广播电台也从边界重新回到国内，20世纪80年代在泰国边界和金边发行的原抵抗组织的月刊《新闻公报》、高棉中立党的《高棉中立报》以及佛教自由民主党类似公报的“报纸”均得以复刊。但大多数高棉语报逐步发展成党派报纸，表达各党派自家的政治观点。另外，原抵抗组织的广播调频90台和柬埔寨电视9台也是在此时成立的，它们鲜明的政治立场为抵抗组织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赢得了不少的选民。

过渡政府的信息教育部还颁发了柬埔寨媒介指导原则，它强调参加竞选的各党派都有权使用媒介。其中D节第4条指出，“独立与自由的媒体应该允许多元化的媒介所有权，促进并捍卫民主。”^[5]正是因为这段时期实行的民主政治和出版自由政策吸引了战时移居国外的高棉记者和编辑，他们纷纷从美国、法国等地重返柬埔寨，加入到新闻队伍之中。一批老报人迅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1993年的44个新闻机构中就有24家属于此类。它们是私营媒介机构，其独立而中立的言论赢得了多半的读者，占市场发行量的54%。这些报纸的出现改变了1975年以来柬埔寨没有独立新闻机构的历史。到1994年底，报纸和广播电台共有50种，报纸的总发行量恢复到70,685份^[6]。这段时期的媒介规模有大有小，虽然还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准，但已成为代表社会不同力量的声音。

媒介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媒介经营则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对当时的柬埔寨而言，媒介产业百废待兴，市场诱人。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后，外国人接踵而至，投资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如《柬埔寨商业周刊》、月刊《湄公河》、《柬埔寨之光》、《柬埔寨时报》等等。当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柬埔寨之光》和《柬埔寨时报》。这些外资媒体发行量虽然还不到总发行量的1/3，但凭借着母公司的资金和丰厚的广告收入，成为柬埔寨国内报纸的强劲对手。一些本地报纸由于经营不善而被他们挤出了市场，如中文的《亚洲新闻时报》就是其中之一。外资报纸在柬埔寨发挥了两大作用：一是凭着它们现代化的设备和新闻采访方式及规范的经营管理模式，为本地报纸提供了办报经验；二是为西方人了解柬埔寨提供信息渠道，为他们在柬埔寨投资经商出谋划策。

二 联合政府不联合，新闻自由被党派斗争湮没

1997年，第一首相、人民党的领袖洪森和第二首相诺罗敦·拉那烈（属奉辛比克党，简称“奉党”）为扩充本党实力的权力角斗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致使联合政府再次分裂，此次分裂也再次造成了柬埔寨媒介的分裂。柬埔寨联合政府中大部分人是原金边政府的官员，因而形成了以人民党为主导的执政模式，因此在人民党与奉党的权力斗争期间，人民党的媒介在媒介体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如政府的电视台对其他电视台的新闻和节目负有监察的责任，私营电视台在报道新闻时也要经过政府电视台的检查，几家反对党的报纸遭到人民党关闭，奉辛比克党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遭到查封。这样一来，其他派别的报纸与人民党自然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党派报纸相互指责，公开对骂，但多数报纸对洪森提出了直率的批评^[7]。例如，《澳大利亚人》报刊登过一组卡通画谴责由人民党领导洪森制造的政变，画中洪森在掩埋一堆白骨，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在此次政变中丧生的人数。其他党派杂志在报道高层官员时，经常称之为“狗”、“耗子”或“猪”^[8]。不幸的是，党派斗争给新闻记者也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洪森与拉那烈两派都使用过暴力控制媒介，有的记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例如，早在1994年，就有3名记者被害，9家报纸被政府关闭。奉辛比克党报《晨报》

(*Morning News*) 的编辑骏农 (Ngon Nuon)，因为报道了人民党高级官员参与政变和省级官员的腐败而遭到监禁。1997年5月，柬埔寨国家电视台 (TVK) 在西哈努克村的分台因为拒绝播送奉党一位领导的讲话也遭到袭击，一位电视操作员当场丧生^[9]。人民党与奉党之间的新闻争夺充分体现在对广播电台的争夺上。奉党在联合政府刚成立时获得了广播电台 FM 90 和 FM 90.5 的执照，慑于人民党的严控，这两家广播电台始终保持低调，对人民党一般不采取敌对态度。但在1997年的政变中，FM90台被亲人民党的军队没收，矛盾缓解之后才被退还给奉党。2003年全国大选后，两党关系再次陷入僵局，这两家广播电台全都遭到关闭。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高压下，柬埔寨媒介也存在着一支不同的声音。独立经营的“蜂窝广播电台” (Beehive Radio) 1997年虽也遭到过警察的洗劫和没收，1999年才恢复广播，但其经营者宋安铎 (Sonando) 却另辟蹊径，向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出售广播时段，播送高棉语的新闻和评论，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广播电台。柬埔寨政府曾经以限制国外媒介报道为理由对其加以制止，但终因遭到听众的抗议而收回成命。但不久之后，宋安铎被指控采访批评政府政策的社会活动家而遭到两次监禁。在2008年柬埔寨全国大选期间，宋安铎故伎重演，又向森朗西党、人权党和拉那烈党出售广播时段，每天为以上各党派播送一小时的新闻节目。虽然以上党派利用其广播频道相互攻击，但其中却包含了有别于政府媒介报道的政治观点。

奉党的军事力量在这场党派斗争中被基本消灭，拉那烈被罢免了首相职务。“与此同时，成立于1995年11月的反对党森朗西党 (Sam Rainsy Party) 在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的斗争夹缝中崛起，取代奉党成为人民党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在2008年大选后人民党已具备单独执政的能力，但为了防止奉党倒向反对党而加速反对党派联盟的形成，同时也为了显示柬埔寨政治民主，人民党仍继续选择与奉党联合执政。”^[10]

三 和平时期新闻控制的模式：新闻检查、新闻法与贿赂

柬埔寨1999年的宪法规定，“柬埔寨王国实行自由多党民主制度。柬埔寨公民是自己国家命运的

主人。所有权力属于公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11] 多党民主制为报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政府虽然对广电业的所有权实行严格管理，却也能够容忍报纸所有权的“多元化”，在发行量方面不实行控制。和平时期的媒介表面上可以分成三类：亲政府的媒介、反对党派的报纸和国际性报纸（国际性媒体有《柬埔寨日报》、《金边邮报》、《柬埔寨晚报》、《湄公时报》以及以刊登经济新闻为主的华文报纸）。国际性报纸独立性较强，其记者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而多数的高棉语报纸为党派所有，这些报纸不是沦为某些党派的宣传渠道，就是成为编辑和记者索贿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报纸无法保持中立，其言论都得代表某一方的利益。一些小型的出版物则是随赞助商的改变而改变其立场。“在2000年，只需花400美元就可以买下某家报纸对某个党派的忠诚和支持。”^[12] 因而党派报纸基本没有什么职业道德可言，不仅刊登带有明显政治偏见性的报道，而且充满了互相指责和诽谤的语句，其引用的话语常常没有来源，也很少提供事实证明。所以，读者很难分辨新闻与社论之间的区别。

柬埔寨的主要舆论渠道则被人民党牢牢控制，新闻检查无处不在。“新闻部大臣和王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均由人民党中央委员、新闻发言人乔干纳烈担任。人民党利用一党执政的优势在私有化过程中将一批重点国有企业变成党产，迅速成为多党制下柬埔寨国内财力最雄厚的政党。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柬埔寨人民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参议员频繁以该党名义到基层访贫问苦、捐钱捐物，使人民普遍得到了实惠，因而在历届选举中的得票数节节攀升。”^[13] 为此，人民党党报《人民报》的宣传主题被限制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该党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党，是领导人民开展救国斗争、推翻红色高棉统治、赋予人民第二次生命的解放者和唯一的政治力量”^[14]；二是报道政府的政策和政绩。对于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件，该报一般都采取忽略的态度，但有时为了不使当权者太过窘迫，也会偶尔刊登政府对国际大事件的态度。电视台里的节目内容通常也是政府官员主持基础建设项目揭幕仪式，要不就是在为村民们捐款捐物。政府允许国内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创办少量的报纸，以减少来自西方的责难和压力，但决不姑息反对党的批评宣传，必要时会采取果断措施取消反对党的电台、电视台和刊

物，追究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1995年通过的柬埔寨公民新闻法规定，新闻诽谤的受害者可以通过起诉获得赔偿，法庭可以判决刊物撤回报道或者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柬埔寨的森朗西党推崇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发展自由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该党经常揭露报道政府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在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和青年学生中有较大影响。“人民党就曾经以毁坏名誉罪和组建非法军队罪暂时停止包括森党主席森朗西在内的多名森党议员的豁免权并交由法院定罪，使得森党对人民党和洪森政府的批评有所收敛。”^[15]

柬埔寨人权保护组织2007年在对150名记者进行的调查中发现，65%的记者说害怕受到人身攻击，62%的人说害怕受到起诉，54%的人说曾经受到过此两项威胁，25%的受访者则回答说曾经见过有记者因为收了红包而发表正面的报道，34%的受访者则回答说知道有同事因为收了红包而取消了某些报道^[16]。2006年，柬埔寨出台了新的政策，废除了部分诬蔑与诽谤的刑事责任。但那之后仍然有记者被指控报道虚假信息 and 犯有煽动罪而遭到起诉，有的则因“伤害他人名声”而被罚款。另外，对于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信息的，政府可以没收其出版物，并责令其停刊30天。至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等术语，法律中却没有具体界定，但凡对政府不利的新闻一般都可援用此规定。所以，报纸记者大都不愿采写与政治斗争相关的新闻，电视台也不愿意播送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而只注重报道政府和人民党的活动与新闻。柬埔寨的记者以收红包而闻名，“参加社会机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要收红包”，替人宣传或是替人“消灾”都得“按红包的分量”决定发稿的版面和长度，因此“仅有法国的国际广播和美国之音在报道那些非法伐木行为和侵占土地的行为。”^[17]

监督的长期缺失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泛滥，“柬埔寨官员工资虽低（省长和各部大臣月工资约200美元，下层公务员约70美元），但拥有高级轿车、豪华别墅和大片良田的却为数不少。官员霸占农民土地、与民争利的腐败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失地农民生活困难，在正当权利得不到维护的情况下转而寄希望于通过大选实现政党轮替来解决。”^[18]

除了政治控制因素以外，地域发展也是限制柬

柬埔寨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柬埔寨人口约 1350 万, 大部分人住在农村地区, 他们文化水平低下, 识字率低, 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 金边市以外几乎没有报纸发行。农村人口通常买不起电视, 全国仅 57% 的家庭有一台电视机, 城市的电视信号覆盖率有限, 农村的电视收视率就更低了。那里的人们较多使用收音机, 收音机既便宜, 又便于携带, 在户外工作时也可以收听, 因而每个省都有转播站, 在全国有 62% 的广播听众。目前, 柬埔寨大约有 369 种报纸, 154 种杂志, 6 家电视台, 13 家广播电台, 但只有 20 - 30 家报纸正常出版, 因为没有资金, 大多数纸质媒介只在节假日或特殊日子才出版^[19]。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唯有互联网在柬埔寨的发

展充满了希望。目前柬埔寨的互联网普及率还非常低, 2008 年, 互联网用户大约 4.4 万。其用户主要是学生, 他们通过互联网收看被政府截控的新闻, 但网速很慢, 基本无法下载。其主要问题是, 市场缺乏投资, 用户消费水平不高。然而, 柬埔寨政府正在招商引资, 部分开发互联网, 国外电信运营商已全面进入柬埔寨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运营商也正着手采用 BOT (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的方式进入柬埔寨互联网市场。可以预见, 柬埔寨政府对国际市场、资源、技术和经济支援的需要, 扩展了它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沟通。也许正是这种沟通将决定柬埔寨互联网与世界的链接及其全面的发展。

【注 释】

[1] Judeth Clarke, "Phonix from the ash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on Cambodia's resurgent free media", *Gazette* 55 (1995), p. 93.

[2] *Ibid.* .

[3] Kek Galabru,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How politics, money and fear control Cambodia's media", Reported by Cambodia League for Promotion and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2008.

[4] *Ibid.* .

[5] 详见 <http://catalogue.nla.gov.au/Record/2644029/>, 2011-9-10。

[6] Judeth Clarke, "Phonix from the ash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on Cambodia's resurgent free media", *Gazette* 55, 1995, pp. 93-111.

[7] Tony Iltis, "Cambodia: media lies exposed". This article was posted on the Green Left Weekly Home Page, 详见: greenleft@peg.apc.org2000-08-07。

[8] Pen Samathy, "Rasmei Kampuchea, Phnom Penh prickly government relations", 详见: <http://news@freedomforum.org>2007-12-07。

[9] Mark Dodd, "Muzzled, Cambodian's independent media are under threa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 24, 1998, p. 26.

[10] 《柬埔寨人民党立足国情巩固执政地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http://www.idcpc.org.cn/globalview/zddlj/106.htm>, 2009-12-15。

[11] 《柬埔寨宪法》, <http://www.hudong.com/wiki/%E6%9F%AC%E5%9F%94%E5%AF%A8%E5%AE%AA%E6%B3%95>, 2011-9-10。

[12] Kek Galabru, *op. cit.* .

[13] 同 [10]。

[14] 同 [10]。

[15] 同 [10]。

[16] 同 [3]。

[17] 此段关于柬埔寨新闻政策和媒介现状的资料来源同 [3]。

[18] 同 [10]。

[19] <http://www.waccglobal.org/en/20031-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communication/658-Media-reform-experiences-in-Cambodia.html>

【责任编辑: 王 宣】